

十年散文漫步

十年散文园地，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一大焦点。

人们至今对她的挑剔还是那样苛刻，对她的褒贬还是那样不一，对她仍然疑虑重重，甚至有人还怀疑她的存在……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因此，我们才下决心充当导游者，引导读者进入这座园地，让你漫游一番，细细瞧瞧这座百花园。我们相信，读者最后会得出和我们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座令人神往的色彩斑斓的百花园！

散文的“二次革命”

十年散文的历史，就是一部散文家的心灵解放史。

散文是直抒胸臆的文体。它能最透明地折射作者的心理状态。在我们建国初期，人们尽情歌唱天下大同。那时有些散文尽管还是粗糙的，但作者的心理还是很健康的。直到今天来读这些散文，依然能感到作者心房的真实的颤动。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由于反右以及一连串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使散文作者的心理状态逐步收缩起来，后来就变成了惊弓之鸟。为了紧跟形势，

他们的创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盯“上”，又要看“下”，既要瞻前又要顾后。许多条条框框形成了整套的应该怎样怎样，不许那样那样，编织了一只无形的“金色牢笼”。许多散文家甘愿躲进了这只“金色牢笼”，于是看到的满处是金色，抒写的也是大家在这“金色牢笼”里看到的金色，久而久之，写“金色”成癖。这样，散文到处都可看到耀眼的、从“金色牢笼”中发出单调的金色的光，尽管色彩是金色的，但由于它的单调和重复，引起了读者的本能厌恶。

尽管如此，读者还能忍受，毕竟这些金色多少还是从生活中折射出来的。到了“文革”，事情完全颠倒了。那些金色的散文够耀眼的了，居然在一些人看来却是黑色的，在六十年代写金色的散文曾轰动一时的杨朔也难遭厄运，他为金色的散文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是散文史上特有的悲剧。于是散文家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样板戏的“三突出”经验，在小说、戏剧中都能接连不断地出现奇迹，产生出很多轰动一时的“佳作”，而独独在散文身上却出不了奇迹，因此在当时垄断文坛的人看来，散文实在不争气。但如果远距离地用今人的眼光来反思一下，这正是散文的光荣。

不过，散文家是够苦的了。他们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心态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们冻僵了，心破碎了，凝固了。他们渴望心灵的解放。

春天来了。当“四人帮”精心纸糊的牢笼一旦倒塌后，散文家的心灵迅即在复苏。

尽管散文家和小说家、戏剧家们一样，心灵的复苏要有一个时间，但相比之下，散文家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散文不必苦心经营谋篇，由于散文是直接心灵的倾泻，多年的积愤一朝得

到倾泻，其势之猛，之速，之烈，大有燎原之势。当时有影响的如讨檄“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如入木三分地昭示“四人帮”爪牙的凶恶品格的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如为“丑小鸭”之类的小人物歌唱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也许现在来看这些佳作，似乎只不过是心灵的自然流露罢了。须知，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些作品所写的“人”，所写的“事”和所抒的“情”在某些经典里是被禁止的，在金色的牢笼里也是看不到的，那是一种无畏的精神的显示。它告诉人们，散文家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他们从“金色的牢笼”里挣脱出来了。如果把“五四”时的散文“极一时之感”称之为散文的一次革命，那么这一次心灵解放，毫无疑问，可称之为散文的“二次革命”。

这次革命是以血泪的怒吼拉开序幕的。人们不会忘记，当“四害”刚刚扫除，严冬还笼罩着祖国的大地，散文凭着它的嗅觉灵敏，直抒胸臆以及篇幅短小等优势，最先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它很快就觉醒和复苏了，率先站出来，含着泪水，大声呐喊。一大批控诉和揭露“四人帮”以及爪牙的罪行，悼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哀祭散文破土而出。如黄宗英的《星》，巴金的《怀念肖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丁宁的《幽燕诗魂》等诞生了。这些散文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用春雷来比喻，那真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这些短小篇章之所以引起这样强烈的震动，在笔者看来，一是它得力于大背景、大形势。十年内乱，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伤痕累累，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有多少人身上莫名其妙地被泼了污水，哀祭散文的兴起，使人们找到了感情的喷发口，因此它好比是一点火星溅到干柴上，势必要引起燎原之势。二是得力于这些作品所抒发的情

感。因为散文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倾心于描摹鸟语花香的画面，绝大多数散文都是甜滋滋的，中间偶尔出现一些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中了“三突出”的邪，虚幻之作较多。而现在这些哀祭散文写的对象大多和作者有直接的亲密关系，作者有切肤之痛，一提起笔，往往就涕泪长流，感情真挚浓烈。人们读到这样的血泪文章，顿时就产生一种把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震动，往往是作者含着泪写，读者含着泪读。因此，这一段时间的哀祭散文的影响就特别强烈。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它和哀祭诗歌一道起到了新时期文学的铺路石的作用。

这一些用血泪凝成的哀祭散文，尽管它在艺术技巧上没有什么突破，而且有很多篇章在布局章法上还有雷同之感，但它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低估。第一，它横扫文坛上的“三突出”的八股风，为散文抒写真情实感作出了榜样。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一看历史，从“文革”十年到新时期文学之间，哀祭散文在其中起了重大的催化转折作用。第二，哀祭散文的特有的血和泪的内涵，使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它无疑是一枚枚烈性炸弹，它炸毁了林彪“四人帮”苦心经营的法西斯专政牢笼，每一篇哀祭散文就仿佛是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的檄文，特别是还和一些议论散文如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巴金《随想录》中的有些篇章等配合作战，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对于揭批林彪“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冲破各种禁区，解放人们思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向人们强烈地昭示了这样一个结论：散文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逐步深入，国内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在这一转折关头，散文的二次革命继续深入，并趋向高潮。其标志就是散文门类中的报告文学

由于近距离和纪实等优势，显得异常活跃。它大胆干预生活，涌现出一批力作，成为广大读者注视的中心热点，在我国报告文学经历的半个多世纪历程中，出现了从来未有的高峰。而抒情小品相对要软弱一些，许多散文家开始转移到回忆往事和追踪历史上，向“后”转。这种向“后”转，也是散文的一种特殊干预生活的方法，对此应该认真分析。从作者成分来看，这类散文大致有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老同志，或老干部、老专家、老作家等，另一种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中青年，或是有这样那样创伤的，或是一些在农村跌打滚爬过的“插青”等。他们回忆的动机也不同，极为复杂：有的是把历史写下来；“立此存照”；有的为故人画像，目的是要和今人对比；有的亦想从历史中寻求某些安慰和刺激……，从八十年代开始，这类散文犹如雨后春笋，有时几乎主宰了整个散文的文坛。如《散文》月刊对1980年——1983年的《散文》月刊上的散文进行评奖，获一等奖的十篇散文中，有六篇是怀旧回忆之作。不可否认，这类散文的佳作也确实特别多，如黄秋耘的《丁香花下》、艾煊的《醒时的梦》、《湖上的梦》、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王英琦的《有一个小镇》、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品》等等。这类散文的价值就是可以使人们从历史的回声听到现实的叹息，而且许多篇章味苦而涩，增加了当今散文的色彩和味道，使得散文园地具有酸甜苦辣的味道，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姿。这类散文也可说是散文二次革命的深入的一种表现，它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向“后”乃是为了向“前”，由于前后对比，人们从中可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因此往往可当历史来读。它也是一种干预生活的手段，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教训。但另一方面从消极意义来考察，写历史，回顾往事成为散文的兴奋点，势必要削弱散文的活力，和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给

人有一种“老了”的感觉。尽管如此，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都比以前一阶段的散文成熟。然而不可原谅的是，散文这一“向后转”，是散文家面对新的形势，缺乏竞争力的一种软弱的表现。它或多或少表现了作者对当前生活的冷漠，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作者心灵解放之艰难。这样影响了散文二次革命的继续深入，使这一场散文二次革命出现了冷热交替的局面。

但不管怎样，出现在这十年中的散文二次革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为了能充分认识、总结散文这一场二次革命，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从内核来看，散文的这场二次革命，是散文家的心灵解放。这个心灵的解放，由原来的封闭向开放的转变；由原来注重写“金色世界”的单向型向以真实地写多味世界的复合型转变；由原来“自我”失落向“自我”回归的转变，等等。对此阐述得最为彻底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提出要把“心交给读者”，散文要当作“遗嘱写”，可以说是散文二次革命的宣言书。这样，就决定了散文的二次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

第二，从形式上看，散文不仅解放了那些被冷落和搁置的一些散文种类，如随笔、游记、哀祭文、传记文学、散文诗、趣味小品、书斋小品及杂文等等，而且注意和其他文体等嫁接联姻，促使和加快了散文文体的裂变和转化。当今的纪实小说的兴趣，就是散文二次革命结出的一大硕果。

第三，散文的这场二次革命，并不是散文孤军奋战，它和其他文体的革命始终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文革”十年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那岁月，散文的崛起和小说、戏剧的崛起呈现了粘着状态。它们互相配合，互相鼓励，互相吸取力量。所以散文的二次革命的生力军并不像“五四”时期第一次散文革命时那

样单纯，在冲锋陷阵的主将中有许多小说家如巴金、王蒙、贾平凹等，都非常引人注目。这样，使这次散文二次革命的战线更为广阔，影响更为深远。

对新时期散文家的扫描

为了能使读者对新时期的散文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里我们想对各类的散文家进行一个初步的扫描。

首先我们应该把目光集中到老一辈散文家身上。他们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如冰心、柯灵、吴组湘、孙犁、郭风、秦牧、肖乾、徐迟、何为、碧野、吴伯箫、王西彦和刘白羽等。几十年来，他们承受了各种压力，痴迷于散文事业，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散文价值观念。他们为人们创造了很多优美的散文，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塑造。他们对原有的散文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是那樣的偏爱和执拗，因此在新时期中，当新时期的散文在阵痛中分娩时，是他们首先提出要“振兴散文”，其勇可嘉。但是如果不对自己以往的散文创作进行严厉的解剖和鉴别，也没有自我否定的决心和勇气，所谓“振兴散文”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散文花朵来装扮新时期的春天，更多的是为原有的散文价值观念的兑现提供新的品种，但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以往种种桎梏的束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逐渐表现出对散文观念变更的反应的迟钝。尽管其中有少数作家如徐迟，在散文变革中充当了报春鸟，显得十分活跃，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老散文家在新时期中，有影响的佳作较少。

在老一辈散文家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批在历次运动中被错误地打下去的作家。他们有思想，有胆识，有锋芒。他们备受挫

折，因此往往也就特别敏感。他们对现实的许多问题本能地会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因此转化到散文中，往往产生出很尖锐的批判力。他们创作欲旺盛，不时有佳作问世，他们用散文创作的实践，恢复了他们的创作青春，恢复了他们原来的道德人格面目。

新时期散文的主力军是一大批中青年散文家。也许这支队伍和小说家队伍相比，要相对地弱些。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新时期散文的中坚和希望。如徐开垒、袁鹰、艾煊、丁宁、石英、苏晨、忆明珠、宋振庭、杨明仪、赵丽宏、周明、王光明、刘成章、叶梦、苏叶、王英琦、唐敏、和谷、薛尔康和曹明华等。他们承上启下，是关键的一代。虽则他们中较多的是喝“狼奶”长大的，但对散文的原有的种种锱弊较为熟悉和痛恨，尤其对以往散文只能在规定的长河航道中爬行徜徉很是不满。因此，一旦新时期的春风又“绿”人间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散文之舟推向大海，让散文散漫地在大海上前进。他们的框框最少，成果最多。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大多数都有几本有影响的散文专集出版，受到人们的注目。尤其可嘉的是前几年小说“性”意识爆炸产生许多超级次品，导致“失重”时，而这些散文家的散文却仍然是熠熠发光，为人们所喜爱。当然，也不能回避，他们中有的人在努力使散文冲破原来的划地为“牢”的圈子，但惯性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拉回原来的“牢”的圈子里踏步。但应该看到，在新时期的散文作家中，这些人是最为勤奋，最肯探索，因而成就也就最大。特别是一些年纪轻的散文家，更是无忧无虑地敞开自己的胸怀，把自己的青春活力，融在自己的散文篇章中，如朝霞下的露珠那样晶莹可爱。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散文作家是未来散文园地的希望所在。

在新时期散文园地里，还活跃着一支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原

来并不是散文园地中的专职园丁。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岗位，有的是教授、学者、专家，有的是将军、省长、司令，有的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奇异经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他们在新时期的春天召唤下，神差鬼使地来到散文园地，充当了园丁。虽则是漫不经心地播下一些种子，但因为这些种子都在他们的感情里漫透了九九八十一天，所以一到土壤里，长出来的居然都是一朵朵奇异的鲜花。如杨绛的《干校六记》 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沈醉的《我的三十年》，伍修权撰写的一些回忆录，惠浴宇的《记铭璜同志》等，都是难得的散文佳作。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一，自我经历曲折丰富，并有传奇色彩，他们的散文也大多是写自我经历，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因此决定了他们的散文具有强烈的纪实性；二，他们都几经历史的沉浮，饱经沧桑，正正反反的经验教训使得他们都能正视以往的历史，具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写散文是把它当历史来写的，当遗嘱一样来写的，尊重历史、再现历史是他们的本能要求，所以他们的散文完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三，他们是散文园地的新兵，没有沾染上散文的种种旧的恶习；他们蔑视法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从容散漫。因此他们的散文最少模式，最有生气，也最为健康。尽管他们写散文是“无心插柳”，但偏偏确是“柳成荫”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最后还应特别提一提那些常到散文园地来“客串”播种耕耘的小说家。其中有的是老牌小说家，但在新时期却一心一意写散文，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如巴金，他在新时期创作的散文集《随想录》，已成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有的是散文小说齐名，说不清他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如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甚丰，出版了《心迹》、《爱的踪迹》等散文专集，在散文界

颇有影响。有的虽偶然为之，但写出的散文独具风采，不同凡响 如陆文夫的《梦天地》 王蒙的《访苏心潮》 冯骥才的《书桌》等。这些作家由于是“客串”散文，他们对散文的原有规矩似乎可以一概不管。尽管像巴金在解放以后也曾写过大量散文，但他对自己这大量散文也毫无留恋之意，甚至想和这些散文彻底决裂，不害怕失去，也不担心自己会一无所有。这种彻底的决心，使他的散文能够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尤其他的散文中的坦率的忏悔意识，使他的自我人格在散文创作中得到升华而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这些小说家由于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取得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如刻画多重性格的丰满人物，抒写丰富多样的情致等等），并把这些经验带到散文创作中来，必然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嬗变，

在新时期十年中，还有大批散文作者显露了良好的势头，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深信，他们将会以优秀的散文佳作，为散文园地描绘更美好的明天。

（范培松）

崛起前的颤动

——新时期散文家创作心态的几个侧面描述

如果一旦把散文家的创作心态作为透视对象，我们就会发觉，这比孤立地考察作家作品将赢得更为开阔的空间或别致的视角。

在某种意义上，散文作品是散文家创作心态的外化，两者构成相互映照相互阐释的较为完整的散文世界。

我们注意到，对新时期散文创作实绩的估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或曰繁荣，或曰萧条。估价的不确定，实在说明了散文创作本身的复杂。简单划一的概括自然难以切近，更不用说吻合创作的 actual。

与复杂的创作实际相联系，散文家表现出非常微妙的创作心态。这是我们考察估价新时期散文创作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新时期，因曾是散文大国而来的自尊与负担，对创作现状的焦灼与忧虑，对历史失误的自省与参悟，献身散文艺术而又“歉收”的失落与寂寞，不甘落伍的躁动与进取，时不时地袭扰着我们的散文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心态系统。散文家不再拥有

宁静的港湾，他们的心在颤动。

对此，我们即令不作精确透辟的理性分析，而只是进行松动的乃至宽泛的描述，也同样可以发觉由此而带来的价值。

尴尬氛围：创作心态生成的背景

在描述新时期散文家创作心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散文创作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包括文学）氛围作一大致的考察。因为散文家的创作心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寻求一种内在的联系，探析散文家的创作心态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和谐与不协调之处，有利于我们在特定的背景上把握和理解散文家创作心态的矛盾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都在发生变化。一个古老的被压抑被扭曲的民族，开始艰难地走向现代化。人们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选择生存的道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在蕴育着一次新的构造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每个中国人都确实无法回避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只要你在“一切都翻了个过”的社会生存下去。

自然而然，直接参与民族文化重构的文学工作者，包括我们的散文家，也无法回避这样的挑战。

在新时期之初，散文几乎与小说诗歌同领文坛风骚。最初的挽悼散文，以浓郁的悲剧意识拨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如巴金的《怀念萧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伤痕文学”——小说。这类散文或记生活的坎坷，或写历史的失误，有家庭悲欢离合，有民族喜怒哀乐，往往以深情的笔触凸立起肩负家庭与民族不幸的悲

剧主人公形象。对美丽的精灵被伤害甚至毁灭的描写，唤醒了人们的价值与尊严，唤醒了人们对民族的责任感。不少散文以“表现的强烈，现代的机数，直接的呼号，直接的揭露，直接而充足的判断（谢·札雷金语）成为拨乱反正的投枪。随着改革的起步和深入，散文并未退却，它也拥抱现实，抒写在改革浪潮中的感情体验。刘真的《望截流》，王光明的《钻石，你在寻找谁》就是这方面的佳作。但从总体上讲，散文对现实的拥抱，是软弱无力的。散文意识到现实的挑战，而答卷却不那么令人满意。作为重要的文学品类之一，散文在文坛上逐渐失去其影响，成为文学中的“第三世界”。有人甚至担心散文会走向解体。

倘若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就可以发现，时下的散文至少面临着下列三个困境：

困境之一：小说诗歌新潮迭起，散文相形见绌；

困境之二：已有散文创作模式和理论规范的重压，散文步履维艰；

困境之三：读者的阅读心理和论家的批评注意有新的转移和选择，散文倍受冷落。

散文与小说成就的反差原因，我们觉得并不完全在于文体的相异。小说的成功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外，恐怕主要得之于小说观念的解放和小说作者的创新。散文却萎缩了它灵活自由的天性，因袭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少了探索，多了保守；少了创业，多了守成。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是在艺术的嬗变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散文家艾煊曾指出这种差异：“小说博采众长，本民族、异民族，互相渗透，互相补益。一切今言古语，一切海内域外的种种奇人异事，尽储万斛胸中。一切现实的超现实的非现实的种种妙法尽于笔端生花。”散文则“温柔敦厚恪守先祖遗制。”中国是

散文大国，“祖宗家产丰厚，自左传宋玉吕氏司马而今，积资何止万贯”（艾煊《面对散文的呓语》《散文世界》1986年10期）深厚的传统，既是财富，也是负担。承传的目的在于超越，若不能超越，也就无所谓散文的发展。而我们在创作中，对深厚的散文传统，往往又不能得其神韵，只取其皮毛。于是，散文作者因袭着历史的重负，不敢越雷池一步，心理定势，手法老化，以至形成某种模式和套路。对此，散文家徐迟感到很奇怪：“散文之为散文，本来就无定格嘛！”不拘一格才能出作品，出人才。（田野《湖北作家的散文对话》，《散文世界》1986年9期）因此，“解放”散文已成为当务之急。

文学读者也有自己的选择。散文主要是表现一种感情体验，或描绘某一生活截面，这是长处也是短处。人们瞩目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渴望在文学中观照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常常满足了读者的这一需求。散文毕竟是轻骑，虽然也能表现重大的现实生活，如叶圣陶的《五月三十日在急雨中》，但比起小说或报告文学，在这方面的功能终究是有限的。散文重情绪，也写细节，但中国一般读者习惯阅读情节性强的作品，因此，散文常遭冷遇。近年来，纪实文学的兴起，也反映出读者求真心理的趋强。这对散文来说，是一种福音。读者厌恶了虚伪的散文，而真诚的散文所赢得的读者并不亚于小说。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赢得了几代读者的泪水和口碑。许多散文名篇，千古不朽，拥有无限的读者。

当我们粗略地考察后，可以发觉：散文在大背景之下的困境，是新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散文家的创作心态，是在上述尴尬的氛围下生存着，矛盾运动着。如此碰撞的结果，迸发出一声“振兴散文”或“复兴散文”的口号。这是散文家创作心态总体

调整的开始，对困境的自知之明，对散文价值的重新寻找。

在一定意义上，尴尬的氛围，倒是为散文家冷静的自省与热切的创造企求提供了心理契机，孕育了创作的内驱力。

迷途知返：真诚的回归

散文家们，尤其是亲历了历史坎坷的散文家们，以异样复杂的心境回味、审视已逝的，但客观存在着的过去。在新时期的文坛，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不仅是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都曾经重新检阅历史。这不是寻求解脱；也不是仅仅为了卸下因袭着的沉重的历史负荷，而是探求历史给予现实的启示。

反思的焦点在散文的“真”字上。

中国散文有许多深厚的传统，但其本色是“真”，即表现真切的人生体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性情”，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名篇佳作，差不多都具备这样的本色。相反，虚假境界则是散文的大敌。

应当说，以前散文的失误首先在“真”上发生了偏差。人们都普遍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应孤立地考察历史的失误。因为，在假大空的散文视角里，隐潜着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心理。“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中，在各个现实领域，虚假浮夸不大遇到批评和制裁，而真实地反映情况，即说真话，却常常遭到难以想象的打击。这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而散文创作以其更直接的现实性，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比其他艺术显著”（孙犁《远道集·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许多散文家最初是相当真诚地用散文这一文学样式表现了自己的错觉：把假话当真理，视假

象为本质。由真假不分，而逐渐变成以假代真。杨朔和他同时代的不少散文家，陷入了悲剧性的困境：坚信自己是以执着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反映现实，而在创作中又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现实主义因素。这不仅表现在没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描绘现实图景，同时还表现了虚情假意在创作中的渗透。于是，后来不少散文家为此汗颜，甚至受到并不温和的批评。许多散文家的内心世界呈现痛苦状。

清醒地辨析弯路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巴金便曾坦率地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种历史的反思是作家痛苦与赤诚的煎熬：“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心灵中的泥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巴金《真理集·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让我们感到了他痛苦的流血的灵魂。真可谓：“痛定思痛，何其痛也。”

作为历史反思的某种延续或拓展，是散文界对散文创作弊病的及时“诊断”。

当避开熙熙攘攘的喧嚣，冷静地审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时，人们又发现：“就散文创作的规律而言，真实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主要从质量上看，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孙犁《远道集·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不仅是老散文家，年轻的一代也同样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说真话，抒真情，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事实上未必。虚假的文风曾经统治了我们文坛那么漫长的岁月，多少戴着作家桂冠的写作者言不由衷，吐不出属于他自己的、发自内心的声

音，那是何等的可悲。改变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直到今天还在追风趋时，自觉地讲着违心的话。(赵丽宏：《亮出你灵魂的色彩来》)

散文圈以外读者的反映也不能不在散文家心中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一份从读者中来的报告中写到：“虚假的散文，伪造的散文，打着旗号，插着散文标签，漂亮的词句掩盖着假山假水、假人假事、假情假意，让简单的政治说教充斥其间的作品，不时出现。”(《滁州市散文阅读情况调查报告》，《散文世界》1985年5期)读者从本能上厌恶假大空的散文，赤裸裸的散文容不得半点砂子，即使再聪明的作者也伪饰不得，作假不得。散文失去读者，往往倒不在技巧，而在失去了散文本色：真。没有真，也就无所谓善与美。

我们觉得，作家基于现实和历史两极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以后创作走向的选择。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散文家创作心态中“真”“假”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换，散文家在自觉不自觉地汰洗创作心理中的虚假因素。这既是散文家审美理想的确立，也是散文家人格的净化。散文家在错综复杂的散文创作心态运动中，有一个声音变得愈来愈清晰和强烈：“要真！要真！要真！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赵丽宏：《亮出你灵魂的色彩来》)

巴金五集《随想录》是散文家日趋增强的求真心理的典型标志。新时期散文终于告别虚假，而呈现新的选择指向：去伪求真。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寂之后，《随想录》赞誉之声鹊起。人们超出文学的范畴，从思想、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探讨其价值。一致肯定的是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